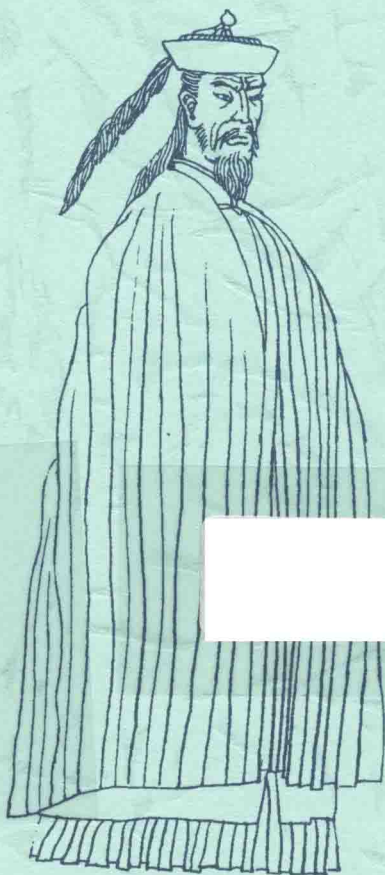


曾国藩



通俗军事文库
中华名将系列

张一文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通俗军事文库/中华名将系列

曾 国 藩

张一文 著

一、早年生涯	(1)
二、创建	(4)
三、削平	(12)
四、攻占武汉	(17)
五、湘口渡江	(21)
六、围攻长沙	(27)
七、	(33)
八、	(41)
九、	(47)
十、	(52)
十一、	(61)
十二、	(72)
十三、	(77)
十四、	(96)
十五、	(107)
十六、	(122)
★附录	
曾國藩生平大事年表	(138)

军事科学出版社
北 京

目 录

一、早年生涯	(1)
二、创建湘军	(4)
三、湘军营制	(12)
四、攻占武汉	(17)
五、湖口挫败	(21)
六、围守江西	(27)
七、援攻武昌	(33)
八、奉命援浙	(41)
九、四路围皖	(47)
十、围守祁门	(52)
十一、攻占安庆	(61)
十二、进围金陵	(72)
十三、攻占金陵	(77)
十四、攻捻受挫	(96)
十五、热心洋务	(107)
十六、功过评说	(122)
★附录	
曾国藩生平大事年表	(138)

一、早年生涯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后改名国藩，号涤生。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南一个名叫白杨坪（今属双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祖父名玉屏，字星冈。父亲名麟书，母江氏，生有4女5男。曾国藩在兄弟5人中排行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称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称老六；四弟曾国荃，字沅甫，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曾贞干。

曾家是个土财主，世代没有人做官，其祖父和父亲便一心希望他刻苦读书，取得功名，光耀门庭。曾国藩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他自7岁起就开始在其父亲执教的家塾中上学。20岁时开始到衡阳唐氏家塾和湘乡涟滨书院求学。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考中秀才后，又入湖南的最高学府——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师从欧阳厚钧，开始接受系统的国学知识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这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834年考取湖南乡试举人后，就动身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结果虽然落榜，但却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回乡后他发愤苦读二十三史，积累了较厚的历史和古文知识，为他尔后进升仕途和研究学术打下了基础。1838年，他再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获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朝考得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1840年庶吉士散馆，列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从此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京宦生涯。

1840至1847年间，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他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大量读书，广为交游，精心研究历代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治国方略，总结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为他后来步步高升奠定了基础。早在会考期间，曾国藩就引起主考官穆彰阿的注意和赏识。当时穆彰阿是道光皇帝宠信的重臣，在用人方面，道光帝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正是由于穆彰阿的举荐，曾国藩于1847年破格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此后4年中，又遍兼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衔，5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深受皇恩，总思图报，于是他连连上奏，希望打动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他大谈发现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并举荐了一些可用之才；他鉴于武备废弛，申述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建议裁兵节饷和加强训练。他甚至批评咸丰皇帝骄傲自满、言行不一，提出皇上要防琐碎之风，杜文饰之风，去骄矜之气。咸丰帝看到这本奏章后大为光火，披览未毕，就把它掷在地上，以后由于大臣们的说情，才免于给曾国藩治罪。自此之后，他的锋

芒收敛，处事趋于谨慎，再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上。十余年的京宦生活，使他初步领略到了官场习气的沉闷，发觉自己虽是个二品京官，并不能对朝政大局产生什么影响，使他早年那颗热衷功名、目空一切的心渐渐冷却下来，甚至发出补天乏术的慨叹！

二、创建湘军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与压迫，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趋激化，人民纷纷起而抗争。当时，广西各种矛盾也十分尖锐，而统治阶级的力量又相对薄弱，起义武装遍及全省。1844年，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多次应试落第后不满于外敌欺凌和社会黑暗，便吸取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创立以宗教为形式的农民斗争组织——拜上帝会。1844年夏，他偕同冯云山深入广西传播教义。经过几年艰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终于在广西紫荆山区站稳了脚跟，吸收当地具有反抗思想的青年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为信徒，并与他们结成领导核心，筹划武装起义。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会众到桂平金田村“团营”集结。到年底，前往“团营”的会众达2万余人。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正式宣布起义，自称天王，建号太平天国，起义武装称太平军。9月，太平军冲破前来“围剿”的清军的重重围困，攻占永安县城（今蒙山）。洪秀全在这里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次年4月，自永安突围北攻桂林，6月破全州，进入湖南，在道州（今道县）扩充队伍，并确定“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大

举向长江流域进军。

1852年7月，在京当官十余年的曾国藩，得到了去江西担任乡试正考官的差事，并获准于事罢之后回家探亲。8月9日，曾国藩离开京城南下，9月8日行抵安徽太湖县境内的小池驿，接到其母江氏去世的噩耗，便迅速到九江搭船西上。到武汉时，得知长沙正被太平军围攻，便从岳州改行旱路，经湘阴、宁乡转回湘乡故里奔丧。

太平军攻长沙，先由肖朝贵率领2000人奔袭。抵达长沙外围后，第二天开始攻城，战斗中肖朝贵不幸中炮受伤阵亡，进攻遂停了下来。到10月13日洪秀全、杨秀清率大队赶到时，清军各路援军已相继抵达，守城总兵力已达3万余人，战事遂陷入僵持状态。11月30日，太平军撤围北上，于12月13日，占领岳州，22日抵达武昌外围，连占汉阳、汉口，围困武昌，兵锋锐不可当。

在太平军进攻面前，各路清军一触即溃，八旗、绿营都不中用。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在一片惊慌之余，便发布命令，要求南方各省普遍举办团练，以阻扼太平军的进攻。1853年1月8日，朝廷任命正在湖南湘乡奔丧的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1月21日，曾国藩在家中接到令其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的命令。这时，湖北武昌已被太平军攻下，军事形势更加严峻，作为深受皇恩的曾国藩，不顾为母亲守孝的封建礼节，决定前往长

沙赴任，由此投入到镇压太平军、挽救清王朝的斗争中去。1月25日，他从家里动身前往省城，于30日赶到长沙，与巡抚张亮基等共筹防剿事宜。面对日渐糜烂的军事形势，曾国藩心里明白，八旗、绿营等正规武装都阻挡不了太平军的凌厉攻势，零星的团练武装更是无济于事，不堪一击。这时，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利用举办团练的名义和权力，来创立一支新的地主武装。这样，或许在协助朝廷镇压太平军的斗争中，能助上一臂之力。到了长沙的第二天，他就向清廷上了一份奏章，提出了他的创办新军的主张。他明确提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显然，这已不是在办团练，而是在建立一支新的武装。

曾国藩在上面这份奏章中，对他要另创新军的意图还有点遮遮掩掩不敢明说，但他在给朋友的信函中就说得明白多了。如他在给王鑫的信中说：“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

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在这里，曾国藩心目中的新军轮廓就很明显了。他已成竹在胸，准备大干一场。

早在长沙解围之后，湖南巡抚张亮基就从湘乡等地调来了千余团丁，以加强省城的防守。曾国藩到长沙后，就先将这千余人，按照戚家军的编制方法，分为左、中、右三营，以罗泽南统中营，王鑫统左营，邹寿璋统右营，开始逐日操练。这便是最初的湘军。之后经过半年招募扩充，至同年8月，队伍已扩充至10营6000人。

在这半年期间，军事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53年2月9日，太平军撤出武汉，水陆夹江东下，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并于3月19日攻占金陵（今南京），将其定为都城，改称天京。然后派出两支部队北伐、西征。西征太平军于同年6月9日进抵江西省城南昌城下。新任江西巡抚江忠源向湖南求救。曾国藩与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商量之后，即派罗泽南率领湘军去救南昌，但这支部队首战不利，在南昌外围就被太平军击败。

曾国藩的身份是团练大臣。这样一个官职，既非地方大吏，更非钦差大臣，处境十分尴尬。他到长沙不久，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由湖南布政使署理巡抚，原云南布政使徐有任调任湖南布政使，衡永郴桂道道员陶恩培升任按察使，这三个人对曾国

藩借题发挥地另练新兵，都不以为然。特别是提督魏起豹对曾国藩越职侵权、过问绿营操练事宜，一度引起兵勇冲突尤为不满。这样的政治环境，使曾国藩无法在长沙呆下去。他只好以湘南形势不稳、须前去坐镇为借口，于1853年9月离开长沙，移驻衡州（今衡阳市）。经过这次挫折，他愈加感到绿营兵的腐败，也更加坚定了重建新军的决心。

他把在长沙亲手招募的湘勇带往衡州，以500人为一营，稍加整编，凑成10营5000人，继续进行训练。鉴于太平军在长江里建有一支庞大的水师，并控制着自武汉至金陵间的长江水域。因此，要想战胜太平军，就必须创建一支水师。正好这时清廷也有创建水师的谕旨，曾国藩到了衡州以后，就着手筹建水师。他设法筹集资金，准备制造战船。但起初不知船制，后来守备成名标自长沙来，告知快蟹船、舢板船的制式；同知褚汝航自桂林来，告知长龙船的制式，于是招聘工匠，在湘潭设立分厂，加紧建造战船。与此同时，他还派人到广东购买洋炮，准备装备水师战船。

在湘军筹建的过程中，由于西征太平军又沿长江节节向上游推进，连占汉口、汉阳，武昌再次告急。清廷于10月29日、11月3日和15日，接连下了三道谕旨，命令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曾国藩，统带练勇驰援湖北。然在此期间，太平军为集中兵力进攻安徽庐州（今合肥），主动退出了汉口、汉阳。

因此，曾国藩以此为由，提出暂缓援鄂，并进一步申述目前不能出省作战的理由。他说：太平军拥有庞大的水师，而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仍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等舟师办有头绪，亲自统带驰赶下游。曾国藩这一奏报，非但没有受到训斥，皇上反表扬说：所虑甚是，你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

1853年底，太平军自安庆北上，围攻庐州。咸丰皇帝又于12月12日，命令曾国藩著即赶办船只炮位，并统带前募楚勇6000，经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西，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舒、桐等城，并可牵制太平军北上之路。曾国藩接旨后，认为船炮等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不能出省作战。他于12月26日奏报说：“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臣北望宸极，念君父之忧劳；东望皖江，痛舒、庐之危急，寸心为捣，片刻难安。而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必须明春乃可成行。”咸丰帝接读奏报，大为不满，并作了如下朱批：“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赶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

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貽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接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思蕙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言词十分严厉，连挖苦带激将，命令曾国藩立即出动。然曾国藩接读严旨后，并未不顾现实，委曲求全，放弃自己的主张。他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又上了一份奏章，进一步申述自己的意见，坚持目前尚未准备就绪，不能赴皖。他详谈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必须等所购之大炮运到；二是黄州以下“节节有贼”，水路不能直达皖境；三是当务之急是堵截江面，力保武昌；四是所练之勇正在郴州、桂阳州一带剿办土匪，不能马上撤回；五是饷乏兵单。曾国藩申述了目前不能赴皖的五条理由之后表示：

“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曾国藩敢于在皇帝面前说“不”，这在封建社会里，是需要有很高的胆识的，这是他高于他的国僚的地方。而咸丰帝接读曾国藩的奏报之后，也没有坚持己见，并能听取他的意见，不再催他赴援安徽，还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思蕙之罪，殊属非是。”还算能够听取臣僚们的意见，有一定的雅量。

由于曾国藩没有贸然出征，从而赢得了继续造船、购炮和练兵的时间。两个月后，战船办齐，大炮运到，他才率领水陆师出征。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不足以战胜它。因此，在皇上屡颁谕旨催他出征的情况下，他能冷静地看到自身条件尚不成熟，并如实地禀报，而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贸然出兵，从而赢得了充分的练兵时间，练就了一支有战斗力的湘军。如果曾国藩是一个平庸之辈，为了保住乌纱，没有自己的主见；或在皇上的谕旨面前就轻易放弃自己的主见，违心地屈从皇上的旨意，仓促出战，则必败无疑。那么，湘军也许就会夭折在襁褓之中。

1854年初，各厂造船工作完成，共造成作座船用的拖罟船1只，快蟹船40只，长龙船40只，舢板船80只，由钓钩船改制战船120只，另雇用民船百余只，配炮570位，编成水师5000人，陆军5000人。水师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军5000人分作10营，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计员弁、兵勇、佚役共1.7万人。2月25日自衡州统率湘军水陆师北上，同时发布《讨粤匪檄》，大肆污蔑，攻击太平天国革命，号召各地士绅行动起来，支援湘军，对太平军作战，以捍卫封建统治的秩序。

三、湘军营制

清朝的正规武装有八旗、绿营两种。

八旗，又称旗营，是满清贵族入关前建立的武装，此时共约 25 万人。绿营，以执绿色旗帜而得名，是满洲贵族入关以后陆续改编的汉族地主武装，此时约 65 万人。八旗、绿营都有名籍，弁兵父子相承，世代为业。

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已看到八旗、绿营腐朽不堪的状况，决定改弦更张，另起炉灶。他所采用的编组部队的编制，略仿明代戚继光所编练的戚家军的编制：陆军以营为基本战斗单位，设营官 1 人，各管 500 人；营以下设前、后、左、右 4 哨，哨设哨官、哨长各 1 人，哨以下辖 8 队，各队火器、冷兵器相间配备；每队设什长 1 人，正勇 10~12 人，伙勇 1 人。营以下除设立 4 哨外，另设有营官亲兵 6 队，3 队刀矛，1 队小枪，2 队劈山炮。此外，还采用长伕之制，全营配长伕 180 名，行军时担负运输任务，扎营时担负挖壕筑墙任务，类似于后来的辎重兵和工兵。湘军哨以下各队，均采用冷兵器与火器相间配置，以便优势互补，有利于战斗力的提高。

湘军水师的营制前人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多，主要是曾国藩根据新的情况自行创制的。如果说陆营的编制采用冷热、长短兵器相间配制的话，那么，水师船只的编制，则采用大、中、小型船只相间配

置的办法。建军之初，湘军水师每营425人，设营官一员，每船设哨官一员。营官领快蟹船1只，各哨官分领长龙船10只，舢板船10只，合计1营配备船21只。快蟹船配桨手28人，橹工8人，舱长1人，头工1人，舵工2人，炮手6人，共46人。长龙船配桨手16人，橹工4人，头工1人，舵工1人，炮手2人，共24人，配备头炮2位，边炮4位，梢炮1位。舢板船配桨手10人，头工1人，舵工1人，炮手2人，配备头炮1位，边炮2位，梢炮1位。湘军水营的船只编制，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作战的损折和经验教训的丰富，到了中后期，船只编制断断趋向中小型化。

湘军模仿戚家军的地方，还在于它对官兵的选募。湘军的各级军官，采取层层选拔的办法，即大帅挑选统领，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从而能逐级加以节制。选用官弁的条件是不怕死，不急急于名利，能耐受辛苦，尤其要具备“忠义血性”。湘军兵勇的招募，开始由营官全权负责，到偏僻山区、乡村，招募朴实有土气的年青力壮的农民；凡油头滑面、有市井气、有衙门气的人一概不用。在招募时，每人都要造册，注明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姓名，以及本人的箕斗（指纹）。正是由于采用以上措施，兵系土著，有家室顾恋，到营后就便于管束，万一私逃，也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稽查。

湘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薪饷较厚。一般士兵每月银四两二钱，较绿营兵要高出3倍。如此丰厚的薪饷，对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曾国藩称之为“厚饷养兵。”

曾国藩对湘军还注意加强训练。他认为“训”与“练”内容不同；“训”就是对士兵进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封建思想灌输。早在长沙时，曾国藩就每逢三、八日进行操演，反复进行说教。

“练”就是教弁勇练习技击、枪法和阵式。勇丁要练冷、热兵器的使用，还要练跑坡、跳坑、系沙袋步行。对军中劈山炮的射击技术尤为讲求。为了保障训练内容落到实处，他还制定了营规二十二条，规定如何扎营、开仗、行军、守夜以及保养军器等。此外，还发布纪律，禁止吸洋烟（鸦片）、赌博、奸淫、喧哗、谣言、结盟、拜会，还禁穿奇装异服。

曾国藩还把训练内容，营规纪律，编成通俗易懂、便于记诵的歌诀，计有《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和《解散歌》。现选摘如下：

在《水师得胜歌》中唱道：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